

發展理論與因應變遷

朱秉義

一、

我們試一審視五十多年來全球大部份地區猛烈地捲入現代化的過程，則展現於價值與制度方面的改變，無異證明全人類正處在一個巨變的時代；而究其變遷的實際，則未始非工業化與都市化兩大勢力交互運作的結果。當然，說這一股社會變遷，與分化、新技術、明顯的經濟不平等、新意識形態以及人口變遷息息相關，亦未嘗不可。至若現代化的發展邏輯，雖頗多爭議而未獲定論，然簡略歸納學者的分析，不外遵循西方先進國家的發展方式而定向同一發展路線，或囿於各發展中國家的歷史文化背景，而走出多元異質的發展方向兩種類型。

中華民族是個不怕變的民族，歷代也有因應變局的經驗，並大都能衝破遭遇到的時代橫逆，而其所遺留下來的經驗模式，亦足供後世子孫參考採擇。遺憾的是，我們這一代面對的是人類前所未有的巨變，很難向歷史經驗求助。爲了適存於世而不致慘遭淘汰，勢非謙卑地向應變理論精密、經驗豐富的西方先進國學習不可。也就是說，光有應變的精神而無應變

的方法是行不通的。身爲社會精英的知識份子，除了在世界觀方面要拓寬視野而外，爲社會大眾指出未來可能的趨勢尤其重要。我們固然不可因聽到「二十一世紀乃中國人的世紀」的諛詞而趾高氣揚，但是扮演重要角色的擔當則是不容自棄。爲了將來演出時不致走樣，我們有必要實實在在地早點從知彼知己做起。

二、

長期以來在有關社會變遷因素的研討中，由於論者觀點的不同，大別可分爲兩派，一般將之命名爲自發的變遷動力說及外來的變遷動力說。兩派的觀察均十分入微，而持論也都能言之成理。

自發的變遷動力說基本上延續社會乃是一個有機體系的類推架構，從社會體系內部來觀察變遷動力的來源。把社會看作活生生的生物有機體，歷經出生、成長、成熟、老化以及死亡等幾個階段。社會變遷的產生，乃是基於社會內部結構發生種種生物體生成的過程，或是萌發於結構內部個體創新活動的累積。不管變遷的來源是屬於類生物性的，或個體創新的

累積，這派學說，皆採取一個漸進內因說的變遷觀點來說明社會演化的歷程。

正因爲自發的變遷動力說，將社會看作獨立自主的有機體，並採取一個封閉的觀察點作爲學說建構的基本前提，難免暴露出解釋力不夠周延的缺陷，因而引發變遷動力外來論的發展，以填補它所留下來的理論空隙。

外來的變遷動力說，雖則認同社會變遷有一部分源於體系內部的創新，但却採取一個較爲開放的觀察點來探討社會變遷的因果關係。此派認爲任何社會的處境，除少數原始部落外，都不是一個孤立的或與世隔絕的存在，確切地說，它與其他社會體系必然維持一種血肉相連的生存連鎖關係。在這個生存連鎖之間，自然產生一種文化傳散的現象。基本上社會與社會之間的文化傳散現象，依社會變遷動力外來說的看法，不外兩種形式：一爲自然傳散；另一則爲強迫傳散。所謂文化的自然傳散，是指由於文化交流或商業往來，在各結構體質不一致的社會之間，產生文化素質較低區主動採行高文化素質區的社經文化結構。強迫文化傳散

則是，強勢文化憑藉其政治軍事上的優勢力量，強迫弱勢文化接受其社經結構與意識形態。因此，自然傳散所造成的變遷過程，本質上是種漸進的變遷類型，而強迫傳散所造成的變遷過程，則多半是一種激進的變遷類型。

三、

一方面是社會學本身的發展，另一方面是整個世界融合成一個巨型的世界體系，這兩種社會變遷動力的解釋模型，在近代社會學家的手中，已逐漸轉化成一個更為精緻龐雜且融入歷史的社會演化觀。起初，這個社會演化觀是以歐洲的歷史經驗為建構核心，甚或可以說，它是社會學轉變為當時急欲解答的問題的化身。

社會學醞釀的結果，到十九世紀的初期終算定形。社會學之父孔德（Auguste Comte）特將社會學劃分為研究社會結構（Social Structure）的社會靜學（Social statics）與研究社會發展過程的社會動學（Social dynamics）。就這一社會學醞釀成形的時代背景來說，那是一個處在世紀大變動的時代，致力於社會現象研究的學者，莫不以探索當時錯綜複雜的時代變動軌跡為畢生追求的志事。傑爾士和蘭登（Gerth and Lander 1963）說得好：

社會學思想的發生，是在應付剛由工業和政治革命所塑成的一個新動態歐洲社會的危機。這種新思想形成的目的，就在製造知識工具，以使社會關係的複雜組織更為簡明。社會學誕生以後，立即

生長在一個變遷迅速的世界中，一個似乎飄浮無定的世界。處在這樣的一個世界，大家由於體驗到看不見及非意願的行為結果，真是驚嚇萬分，不知所措。於是從啟蒙時代、歐洲及美洲的革命及獨立戰爭、拿破崙的征服和失敗、沙皇和梅特涅的反動，乃至英國的工商業力量的爆發等等之中，便萌生出社會學來——由此一類學者所追求的知識探索（Gerth and Lander 1963:26）。對於當時的研究者來說，這種變動乃是意味著社會的蛻變。也就是說，潛藏在該世代背後有隻看不見的手，正推動著西歐走向與傳統歐洲截然不同的道路上去。

也就從這個時期開始直到今日，有個問題始終纏繞在社會學家的腦際：是什麼動因促使原來的歐洲變成今日的歐洲？

這個問題幾乎隱約顯現於韋伯（Weber）所建構的社會學的每一個領域，而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一書中，對這個問題的討論尤其是發揮得淋漓盡致。同時，這種窮究歷史變遷脈絡的好奇心，也就逐漸變成社會學獨特的精神；尤其是在近代探討社會變遷與國家發展的社會學內容方面，呈現得更顯明昭彰。

剛開始的時候，近代社會學家所採取的角度，是以偏於建構兩極對照的傳統—現代社會的理想型，來彰顯傳統歐洲與現代歐洲的迥異

和變遷軌迹。譬如說，斯賓賽（Spencer, 1898）認為歐洲是由傳統的軍事社會演變為工業社會；杜尼斯（Tonies 1957）看出歐洲從傳統單純社區（Community）關係演變成複雜的社會（Society）關係；梅因（Main 1885）點明歐洲人際關係已由地位結合轉變為契約結合；而貝克（Becker 1957）則以神聖與世俗來區別傳統與現代歐洲的差異。此外，涂爾幹（Durkheim, 1933）也指出，歐洲的社會結構型態，是由傳統的機械連帶（Mechanic Solidarity）的結合形式，演進到現代的有機連帶（Organic Solidarity）的結合方式。其中貫穿這些社會學家分析理路的共同特色，就是社會分化這一概念。他們一致認為，造成傳統與現代歐洲社會結構最大的差異，來自結構分化的動因。也就是說，因為工業化與商業化所帶來的分化，使得現代社會裏的歐洲人，面對的不再是個同質性的社會關係網絡，而是一種衍生的、理性的、可以計算的市場關係的價值規範。功能論大師帕森斯（Parsons 1964）便曾總結這一系絡變遷的論述而提出確切的比較來。

他運用更精緻的模式變項（Pattern variables）的方式，將兩類社會中的角色規範與行為期望，化約為五種不同的組合，以彰顯傳統與現代社會的差異：

（一）在人際互動模式方面，由傳統社會尊重特殊性原則，轉變到現代社會崇尚普遍性原則。

(二)就個人情感的表露來說，由傳統的擴散性，變成現代講求特定的狹窄性。

(三)在個人能力評估方面，從傳統注重人品，轉為現代強調辦事能力。

(四)就處事方針來說，也由傳統著重情感取向，演變為現代提倡情感中立，處事不夾雜私情的態度。

(五)在個體與集體價值順序方向，也從傳統以達成集體目標為第一優先，轉變成現代的優先考慮個人的滿足。

要之，兩極對照的傳統——現代社會的歐洲模式，除了以結果排比的建構方式凸顯出過去與現代社會結構的差異外，在這個模型背後，尚有一個牢不可破的意識形態支持著，那就是填滿十九、二十世紀思想家腦中的進步意識。

從當時歐洲社會儘管內部充滿變遷所引起的不安，而器物與精神文明仍執當時世界牛耳，不難得一明證。加上歐洲殖民主義的所向披靡、無往不利，於是更為強化優越的白種人文化的超人意識。這種歷史現實的經驗展現在現代化理論者身上，逐漸便是在理論建構時過度膨脹專屬於西歐經驗的普遍性。因此，塑造了以結構功能論為主體的現代化理論。在研究開發中國家的發展問題時，將得自歐洲經驗的傳統——現代社會的分析模型當作典範，進而將所有的不論是先進或後期的變遷都看作是低度發展邁入發展的相同過程。就從這個特點開始，社會學對變遷問題的探究轉了一個方向，焦點落在對發展及低度發展現象的關懷上。同時，由

於現代理論在解釋這個問題時，所發展出來的模型轉換的推演過程，無異將發展列為現代社會的專屬特質，並且把低度發展看作傳統社會的主要表徵，在這個架構下，「發展」這個概念便涵容一些特殊的意義：

(一)在技術與工業方面，「發展」是指科學方面的使用和大量機械化和工業化。

(二)在經濟方面，「發展」是指市場法則的普遍應用與農業的商品化。

(三)在社會階層化方面，「發展」是指職業結構的分化與開放的社會流動。

(四)在生態環境方面，「發展」是指都市化。

(五)在生活形態方面，「發展」是指高度大眾消費的社會。

至於低度發展對現代化理論者來說，便是在這些方面皆未達到標準的社會，所以通常被繫上「落後」這一標籤。正因如此，現代化理論與後起的依賴理論對低度開發國家的稱謂亦自不同。現代化理論稱之為開發中國家，依賴理論則逕稱之為第三世界或低度發展國家，實際上這些稱謂，指的都是亞、非、拉丁美洲二次大戰後新興的後期發展國家。

對應於此一狀況，引發了後起的、以研究低度開發國家的發展為主體而主張依賴論的社會學家，對以研究開發國家的發展為主體而堅持現代化論的社會學家展開第一階段的抨擊和批判，依賴論指摘現代化理論，不該將得自歐洲社會發展經驗的傳統——現代社會分析模型方

柵圓鑿般套在低度開發國家的變遷路徑上，因為低度國家的落後處境，並不同於歐洲經驗裏的傳統社會模式。相反地，依賴論站在一個不以歐洲世界為中心的對立角度，或則說站在一個被殖民國家的立場，來看發展與低度發展的問題，因而認為低度發展與發展，並非人類史上兩個截然不同，亦非在時間順序上有先後承繼關係的演化階段。換句話說，低度發展不是現代歐洲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前的落後階段，而是與現代歐洲社會形成同步發展的另種社會型態，也是塑造今日進步歐洲的必要結果。法蘭克對於這一點有很明白的說辭：

有點歷史常識的人都知道，低度發展並不是原始的或傳統的現象；低度發展國家的過去和現在根本不同於已開發國家的任何一個階段。目前已開發國家雖然有過未開發的時期，却從來未曾經歷過「低度」的發展。一個國家之所以處於低度開發的狀態，完全是受制於其本身的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的特質和結構。歷史研究發現，低度發展國家和已發展國家之間，過去和目前持續不斷的經濟和其他各方面的關係，才是導致今日低度發展與停滯不前最重要的因素。(Frank, 1969)。

因此，依賴論者認為低度發展是被製造出來的現象，而不是進入現代社會的前導階段。同時，在低度發展與發展之間，存有一種辯證的衝激，乃使歐洲現代社會得到「發展」之利，而使低度發展國家蒙受「低度發展」之弊。如果

我們追溯一下歷史，不難了解這種辯證關係源自二個時期的歷史進程：重商資本主義時期、殖民主義時期以及新殖民主義時期（Hoogvelt, 1983）。而這個過程，實與資本主義的擴張互為表裏：

簡單地說，低度發展並不是肇因於舊制度的殘存，也不是那些與世隔絕、資金欠缺的落後地區在興風作浪。相反地，當初推動其經濟發展的歷史過程，今日反而成為發展的障礙；而這個過程，就是資本主義本身的發展（Frank, 1969）。

以西歐社會為主體所發展出來的資本主義及其衍生而來的殖民主義，對依賴論來說，就像一隻看不見的手，不僅塑造了現今的發展與低度發展兩極現象，同時，透過殖民過程，在低度發展國家內參養了一批依賴發展社會生存的買辦階級，而將所產生的依賴結構深化。所謂「依賴」，杜山多（Dos Santos）有著很完善的闡釋：

是一個制約的情況。這種情況每每使一些國家的經濟受到別的國家的發展和擴張所制約。在二個或更多的經濟體系之間的互賴，以及這些經濟體系與世界貿易之間的互賴關係中，要是有些國家（如優勢國）能夠自我推動與擴張，而其他國家（如依賴國）的擴張與自立不過是優勢國擴張的反映；這種關係一旦建立起來，就形成一種「依賴」關係。這種關係，對依賴國緊接而來的發展，可能有正面或負面的影

響（Dos Santos, 1968）。

基本上，在依賴論者眼中，所謂依賴國的發展，就是低度發展，也就是「食人唾餘」的發展。根據這一觀點，他們根本就沒法接受現代化論者所提出的低度發展（傳統）與發展（現代）之間的因果解釋。甚至也不可能接受現代化論者所提出的脫離落後的低度發展窘境的政策。從挖掘低度發展與發展的成因走向探討解脫低度發展的策略，意味著二十世紀的發展社會學已經進入了另一個高潮，發展理論因而也就成為政府制訂政策的指導。面對低度發展的問題，現代化理論與依賴論雙方，各自依據他們對低度發展成因的解釋，而提出不同的解決方案來。

四、現代化理論，依其結構功能的知識傳統，認為社會體系得以靈活運作，必需具備四大前提：

第一，社會是一個由相互依賴的各部門組合而成的體系。

第二，社會體系內，整體重要性先於個體；要想了解個體部分，須從整體來觀察才行。

第三，部分與整體之間，存有功能性的關係。

第四，部分與部分是因為功能上的互賴相依而結合；整體的存在，有賴部分之間的相互包容。

透過結構功能這四大體系功能互依論的前提，

來估量低度發展國家的發展歷程，便會衍生出二個基本命題：第一，低度發展國家正朝向西歐現代社會演進，原因是它長期受到西方科技文明不斷的衝擊與改變。第二，因此，欲使低度開發國家快速獲得發展的成果，根據結構功能體系互容互賴的原則，全盤採取現代社會的結構特質與行為規範，自是快速獲致發展的一條捷徑。換句話說，以功能互依的現代化理論為基礎的策略，強調的是移植現代歐洲社會的社會結構和意識，而排除低度發展國家的傳統社會結構與行為模式。因此，現代化理論中的經濟發展派，建議以「重組」（即西化）開發中（低度開發）國家的社會文化制度，作為經濟成長的「必要條件」或「限制條件」（Myrdal, 1968）。個人現代性（Individual Modernity）學派則認為，只要開發中（低度發展）國家內化了參與、同理心（empathy）、雄心、個人主義、世俗主義、平等主義、訊息取向、消費取向、都市偏好以及地理流動等心理特質，開發國家便能迅速現代化了（Portes, 1974）。雖然在現代化理論中，林德總有不少派別支流，可是貫穿於現代化理論中間，却有一普遍不變的信念，那就是認為西方經濟、科技的文化傳散過程和社會結構的互容性。也就是說，發展中國家想進入已開發國家之林，長期內將無法避免採取已開發國家的種種特質。

針對現代化理論提出的發展策略，依賴論頗不以為然。所持理由是：第一，現代化論所

指陳的開發中國家，並非處於一種落後的傳統社會階段，而是在一種低度發展的階段；第二，這種低度發展的處境，是與已開發國家的發展共生共存的。甚至可以說，已開發國家的發展，是靠開發中國家低度發展的慘痛歷史經驗換來的；第三，這種低度發展乃是源於已開發國家與低度開發國家間存有一種依賴的發展關係；而這種依賴的結構，在低度發展國家已經「內化」為一股難以打破的勢力，它阻碍突破發展瓶頸的社會力的成長，縱使這種依賴結構與關係能為低度開發國家帶來低度的發展。在這三種狀況束縛下，依賴理論對低度發展的解脫與建立自主工業發展的可能性，難免要抱持一種悲觀的看法。因為這種像無形鎖鏈的依賴結構，不僅是阻碍經濟發展的因素，同時也是這些國家內部社會不公與階級對立的病源。如果說現代化理論所提出的個人主義、平等主義是標示現代社會的特質，那麼在依賴結構底下，這些特質都將成為遙不可及的夢幻；甚至於這些價值的輸入，更會引起激進群眾的革命運動。如此一來，反而使得低度發展國家更無法累積資源，來達成工業化與經濟發展的目標。因此，依賴論在建議發展策略時，便非常注重國家角色的扮演。例如佛塔多(Furtado)氏便認為應由政府建立執行機構，一方面可以避免由於技術變遷而使財富過分集中，造成分配不均的弊端；另一方面應擴大市場，促進技術發展，以滿足大部分人民的需求。孫克爾(Sunkel)則強調，克服依賴也就是改變既

存的結構，以創造自立成長的能力。低度發展國家必須善用種種自然的、技術的以及社會的因素，並能與其他國家維持密切的關係以追求經濟的發展。卡多索(Cardoso)也詳細指出，想要擺脫依賴，就必須要有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結構，來重建社會內部的凝聚力，以改變長期由殖民主義所造成的利益分裂。總之，依賴論者莫不認為，面對未來發展的問題，國家將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也就是說，開發中國家的政府，在未來實際上占據一個關鍵性與決定性的地位。譬如發展政策的選擇與運用、國內外資源的調度與分配、社會力的折衝與協調以及意識形態的塑造與灌輸，在在莫不揉和在開發中國家政府的決策之中。

雖然依賴論的興起，有一半的原因應歸諸於現代化理論對發展現象解釋不盡確切及其所提供的發展策略效果的不彰；不過，依賴論本身對低度發展問題的政策提示，也因軟弱無力而被批評為泛泛之論(O'Brien, 1975)。事實上，這二派提供的發展策略，皆或多或少為開發中國家所採行，而現代化理論甚且因為較早提出，兼之有著美好的憧憬，是以其傳播的範圍和被接受的廣度遠比依賴論為尤大。

五、

最後，需要特別說明的是，除了依賴論與現代化理論之外，解釋落後國家發展問題的，還有華勒斯坦(Wallerstein)所提出的世界體系理論。就解釋依賴與低度發展的原因來看，世界體系理論與依賴論就如孿生兄弟；

只是世界體系理論把眼光投射於全世界，並將之視為一個世界性的資本主義運作下的分工體系。這種世界體系理論產生於十六世紀初期，到十九世紀才逐漸具形化為核心、半邊陲和邊陲三級層系結構。

世界體系理論常因使用與依賴論共同的名詞，如資本主義、殖民主義、核心—邊陲等，而被歸於與依賴論同屬一個理論體系；但是世界體系論者如華勒斯坦(1974-1979)、巴哈(Bach, 1979)却堅持他們是從一個完形(holism)的、亦即整體的角度來詮釋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发展過程，與現代化論及依賴論置重點於部分者不同，此因後者採行以國家為基本分析研究取向之故。華氏認為選擇階級或是國家為起點所建構的理論，不但忽視歷史事實，而且見樹不見林，觀察不夠周延，因此他選擇更為廣泛的，且不受政治文化，即國家界限的圍牆阻遏的經濟整體為分析的架構，認為如此才能確切掌握全球發展與低度發展的問題。世界體系(World system)是華氏理論的重心，不過他界定世界體系不是以共識性為基礎界定，他不認為造成這個體系整合的原因是基於統攝於某個獨斷的意識形態之下；相反地，他認為世界體系之所以成為一個單一的整體，乃是由於多種經濟、社會、政治勢力錯綜複雜的結果所造成。它的本質是緊張的，隨時都有自我瓦解的潛在危機。

華勒斯坦從歷史的研究，指出到目前為止有兩種類型的世界體系：一是世界帝國(World

empire)。如古羅馬與古代中國者屬之；另一則為近代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世界帝國的基礎在於政治軍事的統配；而世界體系則立基於經濟的統配。在一四五〇年到一六四〇年間，世界發展已從一個以政治、軍事統配的帝國類型，轉變到以經濟統配為運作的世界經濟體系。

核心、邊陲和半邊陲構成了近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結構下分工的三個主要運作單位。所謂核心(the core)，是指統配整體世界體系的資源流向，並剝削體系內其他部門的地區，通常指西歐與北美的先進國而言。邊陲(the periphery)是指對外輸出原料並受到核心重大剝削的地區。半邊陲(the semi-periphery)則是指核心與邊陲以外的剩餘地區，這些地區同時處於剝削邊陲與被核心剝削的地位。至於塑造核心、邊陲、半邊陲結構層級的關鍵，華勒斯坦特別排除原先核心地區，即指西歐及北美等先進國家，而邊陲即曾遭受殖民主義剝削的亞、非、拉丁美洲國家的分類法，而審慎地指出，區別的原則不在國境界限的劃分，而在於經濟體系下所負擔的勞務分工。同時，世界體系並非一個靜態的結構；核心、邊陲、半邊陲的層系亦非膠固不變。由於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本身的景氣循環與運作律動，如持續剝削而導致資源耗竭，資本累積困難所造成的經濟停滯，都會引發體系內部層級變動。據華勒斯坦的研究分析，世界體系內部每一時期的經濟停滯現象，就會為體系分工結構

帶來壓力，迫使世界體系不得不重組其生產過程與社會交換網絡，以便克服阻碍資本累積的瓶頸，因此，所謂低度發展與發展過程，就世界體系來看，是同時發生在核心與邊陲的一體過程，但是由於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有其內在的景氣循環與資本累積障礙，這一縫隙使體系內的核心、邊陲、半邊陲各分工單位之間得以垂直流動，因而邊陲地區也就得以發展。

依此而論，世界體系在提示發展可能性方面，似乎要比依賴論略高一籌，那就是把握世界經濟體系轉型的縫隙。但問題是：體系的瓶頸何時才會產生？主控經濟體系運作的核心集團會否被動地接受停滯的現象而坐視他們分工位置的跌落？邊陲集團又如何能掌握躍升的機會、消極地等待核心集團的資本累積出現瓶頸？這些問題懸而不決的時候，也正暴露出世界體系未盡完善的地方。史葛克波(Glencol, 1979)便曾批評華勒斯坦的世界體系太過於經濟化約(economic reductionism)，尤其忽略了體系內各國的獨立自主性及其自主性所能產生的層系流動的效果。

儘管各有闕失，世界體系理論、現代化理論以及依賴論全都對「低度發展及發展」問題提出了一些值得深思的觀點。以下特用簡表羅列此三大派有關發展理論分析取向的異同，以供細案：(表見下頁)

以上回顧變遷理論主要的目的，就在找出觀察社會變遷脈動的變數與理路。有關的變遷理論檢視了發動變遷的各種內在和外因素，

尤其面對發展與低度發展問題時，更提示國家或國家執行機構——政府，在推動現階段社會變遷與國家發展的重要地位，亦說明了變遷是各種主客觀因素及主被動勢力相互激盪、撞擊的結果。

六、

現代化理論與依賴理論對現代化或發展與低度發展的成因及解決策略的爭執，不論孰勝孰負，孰優孰劣，皆代表著兩個不同的觀點與兩個關懷，他們也都切入十九世紀以降以西歐為主，並擴大至全世界的歷史發展與變遷軌道的研究向度。貫穿這個歷史脈絡的事實，正是艾森斯塔(Eisenstadt, 1965)在其「現代化：抗拒與變遷」一書中一開頭便指出的現象：「現代化和追求現代性的熱望，是當代最為普遍的特色。大多數國家全都陷入這個蛛網中——成為現代國家，或是延續自己的現代性傳統」。

當世界變成一個共享的國際政經舞台，現代化的程度、現代性的多寡，或是經濟發展的快慢，變成了測量各國在國際階層體系所占據的等級差序地位的指標，現代化與經濟發展便被刻意經營為一種有計畫的國家發展策略。中華民國政府自播遷來台，上下一心，羣策羣力，除夙夜不懈地策進達成「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目標外，更積極於台灣經濟建設與工業化，期能盡快在這個國際階層體系上迅速爬升。自從民國三十八年開始，展開了一連串的建設行動，至今已有一百九十九個年頭，其中分析

分析單位	理論取向	對發展問題的診斷	解脫低度發展的策略
現代化理論 單一國家	承繼典型功能論的傳統，重點放在國家內部各種次體系的協調整合。	1. 傳統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結構是阻礙發展的絆腳石，亦是低度發展的成因。 2 至於低度發展則是後期現代化國家準備進入現代化國家的前一階段。	全力引進已開發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與行為模式，以取代傳統社會結構，加速體系的協調整合以利轉型。
依賴理論 單一國家	觀察的焦點放在塑造低度發展現象的經濟關係模式，以及依附此經濟關係而生的階級結構。一種典型經濟取向的馬克斯主義帶有濃厚衝突論觀點。	1. 源自於殖民過程的依賴與剝削式經濟關係及其延伸是解釋低度發展現象的主要原因 2 基本上，發展與低度發展是同一過程的兩面。	有賴低度開發國家對外資集團、本土資本家、商業資本家之間的利益仲裁維持相當的自主性，以統整相衝突的利益同為國家發展而努力。
世界體系理論 整個資本主義世界 經濟體系	一種立基於經濟決定論的體系理論，亦即經濟體系的運作邏輯與內部矛盾、塑造體系、本身的成長或萎縮。	1. 處於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邊緣地位是造成低度發展問題的主因。	等待世界經濟體系因內部矛盾所提供的體系流動的機會，使邊陲國家能得以躍升為半邊陲國家。

、探究台灣變遷特性的文章與研究報告，至民國六十年代後半期，可說如雨後春筍般蓬勃地發展。儘管在時間上不過是短短十年不到的光

景，在研究架構與理論採用上正承襲了發展社會學由現代化理論進入依賴論的範型交接的過程，這種現象也反映出台灣光復前後不到十年

的新生代先後放洋歸國後，各自帶回一批新理論觀點來檢視自己土生土長的社會，並期盼在他們各自帶回的發展「大力丸」的滋補下，台灣能夠短期內壯碩強大，成為一個徹頭徹尾的現代化社會。

在這些林林總總的探討台灣社會發展與變遷的文獻中，基本上可分為二派：一派延續現代化理論側重的傳統——現代社會的研究架構，著重於視台灣為一個變遷中的過渡社會，從而分析當前台灣的社會問題，認為問題的產生是起於現代性內化不足所造成的結果。另一派繼承依賴或世界體系理論的批判路線，檢討台灣國家發展過程中的依賴環境以及資源分配的問題。其中比較特殊的是在依賴或世界體系這個系統下的研究，有一部分是外國學者的學術研究，他們通常把台灣視作一個向依賴論挑戰（Baret & Whyte, 1981）與補正世界體系論（Cane, 1984）的異例。至於本國學者，則局限於某些易受依賴論影響的部分加以檢討，顯得較為零星分散，而且較少全面性去探究台灣的依賴問題。換句話說，檢視台灣整體社會變遷脈絡者，仍以現代化理論為主流，間或點綴着依賴論的批判。此種理論運用的夾雜混亂局面，無疑反映學院內部知識傳播的外來性與邊陲性格；同時也抑制了國內學者在批判、分析本身變遷時的創新能力，而將之局限於現代化理論或依賴論兩者間作一抉擇的思考模式。

以現代化理論的架構來詮釋台灣社會變遷過程的論述，大多集中在社會、心理與文化層面，大體上對台灣經驗的分析有如下三點：其一是台灣目前是處於現代化過程中的結構轉型期，是個過渡階段，脫序（anomie）是當前社會的特色。其次是現代性不足是造成社會脫序的主要原因；而所謂現代性不足，一方面是指傳統權威人格的遺毒尚未澈除淨盡，另一方面則是未能建立適切的人倫關係與互動模式。復次是認為台灣多元社會的雛型已略具規模，不過萌發於台灣變遷經驗裏頭的多元型態，是以一種矛盾、混亂的形式存在著，各種社會力、團體、言論立場散佈於社會上各個角落，却缺乏共識的溝通基礎來取得協議。總括上述三點，可說現代化變遷理論下的台灣經驗縮影，是個已經擁有各種準現代性的特質與結構制度，不過帶有顯著的過渡階段特色；這種現象透露出台灣現代化過程中，社會與個人在調適新與舊、現代與傳統上的張力與阻力。

關於台灣經驗，現代化理論的分析重點偏向於社會、文化以及心理各層面。依賴論及世界體系理論則特別關心經濟發展、資源分配以及社會力形成等重大問題。從依賴論與世界體系理論來觀察台灣社會發展的經驗，基本上可分為國外學者與國內學者兩派。就研究觀點而言，國外學者側重從肯定台灣國民政府的角色和肯定台灣經濟發展上與所得均等分配上的成就，來描繪台灣社經發展的經驗；國內學者則特別強調台灣經濟發展上對美國、日本的經濟

與技術上的依賴，以及在三十餘年發展過程中政府在資源分配上，如何造成農、工階級被剝削的處境。在台灣經濟發展過程中，除了農民及勞工的利益被犧牲而外，尚有關於技術依賴的問題。由於歷史背景與地緣政治因素，中華民國主要的技術引進國家厥為美國與日本。近年來台灣經濟發展的策略，似是期望藉助外資的引進與國際企業多國公司的合作生產，來達成加速技術輸入與工業升級的理想目標，當然合作的對象仍以美、日為主，若不了解美、日廠商投資與技術可能轉移的運作方式，則談國際合作與改進工業結構，實無異緣木求魚，終不可得。在這個節骨眼上，依賴論便提供了一個良好的評估架構與觀察角度，來審視日後可能形成的多國企業合作方式。

最後，綜觀以上的分析，我們可由綜合現代化理論與依賴及世界體系理論對台灣經驗的觀察，而得出一系列專屬台灣社會發展與變遷經驗的濃縮特性：

第一，台灣現代化過程，是由政府領導的計畫性社會經濟變遷。

第二，在整個台灣變遷經驗中，是以經濟部門的變動為首，然後再帶動社會其他各部門的變遷。

第三，台灣經濟向依賴論命定式的僵化邏輯挑戰，因其不僅達成高經濟的成長，而且防止了所得分配不均的缺失。

第四，台灣經驗固然是個異例，但仍有技術依賴、落後以及農民與勞工利益被犧

牲等問題的存在。

第五，現階段台灣經驗的社會、文化、心理圖象，仍然是一個脫序階段的問題。

第六，這種脫序現象，是一種新與舊、現代與傳統的思想、觀念以及制度的衝突；同時在個人與社會層面上不斷激盪著。

第七，在傳統與現代不斷撞擊下，台灣顯已露出多元社會的雛形，各種類型的中間團體如消費者文教基金會、主婦聯盟等，全都開始向社會大眾訴說了。

第八，台灣社會多元特質的表現形式，是一種缺乏共識基礎的蛙噪蟬鳴，堪為各方接受的遊戲規則仍在形成中。

第九，如果將台灣經驗化約成社會體系各部門先後的演進階段，那將是一幅經濟先行，社會團體跟進，政治運動迎頭趕上，文化建設趕超不前的奇特畫面。

這些條列式的台灣經驗特性，是從現有的一些研究中抽離出來的，而大部分的研究都將台灣社會變遷的經驗視為既定的及已發展的事實，並未提及變遷經驗中階段性動態過程。此類研究取向雖大多為靜態分析，仍不失為充當日後更詳盡深入研究的基礎。

三十八年來，台灣社會確如一個社會變遷與國家發展的實驗室，向現代化理論與依賴論的專家學者挑戰，在國際上，台灣經濟成就被譽為國際經濟奇蹟；在國內，本土的經濟學家及社會學者則指其為一種依賴的發展。他們所期望的是一種獨立自主、具創造能力的工業發

展所帶來的經濟成長，同時經濟的成就在台灣社會其他方面也展現其驚人的影響力。換句話說，台灣社會風貌的改變，無疑就是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結果。王陽明「一鞭一條痕，一捆一掌血」的話，未嘗不可拿來形容這種狀況。

七、

要是我們檢視一下台灣當前面對的是何等急遽變遷的社會，就不得不承認這是一個轉捩的時代。在這樣的一個時代當中，很可能是危機四伏，却也是充滿轉機。我們究竟會不會光是爲了確保並提高在國際政經體系上所占的等級差序地位，消耗全部精力去追求並維護那些最能滿足物質生活慾望的實用技術和制度，反而一直沉淪於爲物質與形式主義所役使的鍊獄中？抑或有幸早日覺醒過來，確切批判僵化的社會結構，排除由於價值選擇所造成的理解扭曲，而以理性的認知反省，取代非理性的衍生反應，來塑造一個如清儒章學誠所說的「學必期於專精，道必本於全量」，振奮人意志、激發人精神、生命更豐富、人生理想更崇高、社會結構更完美的新文化體系？我想這一前進或後退的命運，大部分是操在當代一些具有共識、能交匯卓見與成就的先知先覺手裏。也就是說，未來台灣社會，或是新中國的前途，必然是取決於今日自由地區健全自主的學術社區裏一些具廣度學識的知識分子的直下承擔，見諸行事。

衆所周知，自從三十八年中華民國政府播遷來台，經由全國上下共同的努力，才有今日一般

所謂的安和樂利的社會表象。試就實施三民主義民主憲政的民權主義方面來說，三十多年來政府一直扮演現代叔孫通的角色，戒慎恐懼地踩出台灣現代化的腳印；至於人民，則是臨深履薄地亦步亦趨走過憲政實習的初階。因此，雖無訓政之名，却有訓政之實。三十八年後，政府爲自己所塑造的社會活性驅使，毅然決然實施解除戒嚴令，開放報禁與黨禁，遂使國際觀感爲之一新，並使台灣一千九百萬長期接受決策引導的人民，立即遭受到有史以來最大限度「主權在民」的驚喜刺激。但是換一個角度來看，這也是一個人民自我能力考驗時代的來臨。

自從民國七十五年起，身爲一個新時代的知識分子，我的心情極爲複雜矛盾，真可以說是憂喜交集，我擔心這將是一個危機四伏的時代，因爲「主權在民」的民權理想雖然終將獲得落實，但是可也引發了一些令人困擾的問題來。未來的當政者人民，袪除了長期習於依賴政府作決策的心理嗎？行將可見的未來台灣社會，勢必成爲一個充滿各方聲浪的言論發表市場，有依賴習慣的人民能分辨涇渭清濁嗎？有勇氣堅持立場嗎？同時在另一方面，我則滿懷樂觀地看到一個充滿轉機時代的曙光。原因是台灣各個學術社區的知識分子，大多逐漸走出他們各自的象牙塔和實驗室，來啓迪、引導一般民衆，並且聲氣互通地關心起諸如消費、環保以及雛妓等社會重大問題，也下定決心要把潛藏於台灣社會黑暗角落的疔瘡與毒瘤，悉

數加以診療，以期逐步將之滌除淨盡。

具體來說，這個時代之所以充滿希望與光明，最主要是每一個個體全都知道他們的權利在那裏，即使是弱勢或是邊陲羣體，也都有其神聖的發言權；並且他們的聲音，不管是多麼地微弱，都能讓社會大眾聽得到。若說這個時代也有陰霾和失望，那是由於個人主義時代的全面降臨，美中不足的是尊重他人權益的心態却未達到成熟的階段。這是說，尊重他人權益的心態的發展速度，仍然要比恰當運用個人主義的新態勢慢一步。因此，「物競天擇」、「弱肉強食」的達爾文強權思想大行其道，而孫中山先生所主張的互助合作的「服務人生觀」却被視爲迂闊而拋諸腦後。如果我們把此時此地台灣的「危機」和「轉機」比喻爲二股洪流，那麼在這兩股巨流的交匯、激盪下，明日的台灣將會是怎樣的社會？今日的台灣社會又是如何塑成的？它們之間有無依存的關係呢？在這個時代的轉捩點上，這些嚴重的問題，是值得大家深思的。我要嚴肅地說，既然我們對於台灣這個未來新中國實驗室的前途有了共識，那麼它的問題就是二十一世紀新中國走上現代化所不可避免的問題，豈可掉以輕心！同時尋求問題的適切解答，也是知識分子不可規避的責任。當然，我們得先擴充我們對整個場景的知識，並加深我們對自己的知識，然後才可以發出「立脚台灣，放眼天下，心懷中國」的豪語而不會感到心虛。